

从成仿吾回忆录中感受长征的历史回响与时代启示

赵森 温尔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90年前，一支怀抱理想的队伍以血肉之躯丈量了两万五千里山河，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战略转移。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读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在这部由长征亲历者、中国现代史上唯一参加长征的大学教授留下的珍贵文献中，我们得以触摸历史的肌理，叩问精神的源流，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寻找长征精神的当代坐标。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评述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经典论断，既是对长征历史地位的权威定性，也是理解长征精神内涵的根本遵循。本文立足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的第一手叙述，从历史、思想与实践三个维度，对上述论断作出深入阐释，以期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提供历史镜鉴。

一、历史坐标：长征何以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次”

要理解长征的历史地位，首先须还原其所处的历史语境。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成仿吾在回忆录中如实记录了出发时的艰难处境：“渐渐地敌人飞机的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增多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抽干池水，捉尽活鱼。”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绝非一次从容部署的行军，而是在绝境中以意志力开辟出的生路。

毛泽东指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成仿吾的回忆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判断的历史依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四道封锁线，每一段行程，都是对人类极限与意志极限的挑战。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平均每天行军约四十里，其艰险程度在人类军事史上确属“第一次”。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以实践证明自身历史正当性的第一次。长征的胜利为此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根本前提。成仿吾以知识分子的

严谨与亲历者的深情，记录下这段历史的真实刻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长征的“第一次”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当年红军三大主力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会师，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伟大转变的开始，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与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宣示：长征作为“宣言书”的思想内涵

毛泽东将长征比作“宣言书”，这一比喻指向长征深刻的政治意蕴。宣言书，意味着立场的鲜明、主张的公开与承诺的郑重。长征以行动而非言辞，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历史使命。

成仿吾的回忆录，为理解这一“宣言书”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他详细记录了红军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时的情景。当地群众因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对外来军队存有深深的戒惧，起初纷纷躲入深山。然而，当他们观察到这支队伍秋毫无犯、公平买卖、尊重民俗，态度才逐渐转变。有人悄悄为红军引路，有人主动提供粮食，有人的子弟跟随队伍走上革命道路。成仿吾指出，这种转变，正是红军政治主张通过行动得以传播的直接体现。

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长征这份“宣言书”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评价这一转折时指出，正是这次会议，使党从此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指引，长征才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从险象环生走向坦途。这是长征这部“宣言书”最具思想深度的篇章。

三、文化传播：长征作为“宣传队”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将长征定义为“宣传队”，揭示了长征作为政治文化传播行动的重要属性。成仿吾亲历长征并承担具体工作，这一点是《长征回忆录》史料价值独特的重要原因。

作为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在长征途中主要承担文化教育宣传工

作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详述了随军办学、为战士扫盲的经历，从出发时目不识丁，抵达陕北时已能读写汉字，并将第一封亲手书写的家书托人带回故乡。这一细节，折射出长征“宣传队”工作的深远意义。它传播的不只是政治主张，更是启蒙意识与人的尊严。

长征沿途，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布告，讲解土地政策，废除苛捐杂税，释放被俘的贫苦士兵并给予路费……成仿吾认为，这些工作的意义，远超军事行动本身。红军所过之处，往往是政治宣传从未抵达的边远地区，大量农民由此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长征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动员与民心工程。

成仿吾特别注重记录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写道，在彝族聚居地，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历史场景。写到苗族群众为伤病红军提供庇护的动人往事。这些记述表明，长征这支“宣传队”，不仅传播了革命理想，更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四、精神播撒：长征作为“播种机”的深远影响

“播种机”这一比喻，是毛泽东对长征历史意义最具前瞻性的判断。种子，意味着潜能、生命力与时间维度上的延续。长征播下的种子，在此后数十年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次第发芽，影响绵延至今。

成仿吾的回忆录，以亲历者的视角揭示了“播种机”意象的具体内涵。他写道，长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淬炼，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雪山草地间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成长。他以自身为例：一个出身书斋、留学日本、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长征的磨砺中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信仰的力量。这种理解，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用脚步、饥饿、寒冷与同伴的牺牲换来的。

成仿吾在长征结束后，以教育事业为阵地，继续播撒革命文化的种子。他

先后主持多所高校工作，将长征精神融入教育实践，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他在晚年整理出版《长征回忆录》，将这部“播种机”的故事托付给后来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历史的责任感与对未来的殷切期望。

五、时代回响：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对现实的照耀。长征胜利90周年，不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节点，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召唤。1978年1月28日，何长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评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的文章——《壮丽的史诗，生动的教材》。这两个定位，揭示了长征历史意义的双重维度：史诗，指向过去，要求我们以敬畏之心铭记与守护；教材，朝向未来，要求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与传承。

90年前，红军在内外交困中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开辟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时至今日，长征精神依然是我们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的重要力量源泉。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不畏艰难、勇于担当、依靠人民、坚定信仰，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为鲜活的时代价值。

历史从未远去，“长征英雄们的革命精神永存！”90年前那台“播种机”所撒下的精神种子，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长成参天大树。而今天，在长征路上砥砺前行的人们，所接续的，正是那颗种子最初萌发时所蕴含的全部力量。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陕西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创新团队项目“延安时期红色教育家办学治校智慧融入新时代教育系统干部培训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5JP199）、2026年陕西省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干部教育国际交流引智基地”、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红色资源与干部教育研究协同创新团队”联合开放课题重点课题“延安时期抗大红色文化融入国防教育的机制建构与路径创新研究”（26GB-JYA003）研究成果。〕

学生课堂参与度与思政课获得感的内在逻辑探析

王琪

学生课堂参与度与思政课获得感是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雨课堂等智能教学工具，教师可以构建更具互动性的教学模式，从而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并最终促进学生的思政课获得感。从理论上讲，学生课堂参与度与思政课获得感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高水平的课堂参与是提升获得感的重要前提，而获得感的增强又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正因如此，如何有效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既是增强思政课获得感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思政课教学改革中亟待突破的难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高校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帮助其在理论阐释与现实观照之间建立联系，从而为增强思政课获得感奠定坚实基础。

一、学生课堂参与度是提升思政课获得感的基础前提

获得感主要强调的是个人主观在外界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个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感性认知。学生课堂参与度与思政课获得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生课堂参与度是提升思政课获得感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好坏，成了评价和检验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认知建构理论的角度来看，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课的核心内容所进行的认识和信服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学生将新知识同已有的认知经验、生活实际联系，并对这些联系进行批判性思考。如果学生只是物理上在场，并没有将思维和情感投入课堂，那么教学内容就无法打动心灵、引起共鸣。因此，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是把外部理论转化为内在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必由之路。

从情感互动的角度分析，参加小组研讨、案例剖析和情景模拟等可促使学生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观点的交锋中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互动不但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而且可以营造出一种集体探究真理的情感氛围，学生在共同体的支持下更容易产生对真理的信服和对集体的归属感，这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上的获得感。在行为践行方面，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能够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和运用，书本知识升华成个人能力与价值，进而获得持久的获得感。

二、思政课获得感是激发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内在动力

思政课获得感一旦形成会成为推动学生不断深入参与课堂学习的强大内在驱动力，根据行为动机理论，个体以后的行为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前的行为结果决定。学生在思政课上主动参与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一积极的体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正反馈，可向学生清楚地表明，在课堂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有意义的，进而加强了学生的参与行为。与之相反，如果课堂参与不能给学生带来任何认知上的启发、情感上的触动或价值上的认同，那么学生就会感到投入和产出失衡，进而产生参与动机的减弱，采取沉默、分心、逃避等策略。

这种由获得感转化而成的动力是内在的、稳定的，外在的压力或者纪律约束虽然也可以促使学生在“在场”，但是常常会带来被动、敷衍的参与形式，而来自内在的获得感的动力却使学生为了获得更多的智力满足、情感共鸣和价值提升而主动地投入其中。在这样的动力下，学生会更加认真地预习并充分深入准备，从而更专心地听讲以及更加积极地与教师、同学交流。由此，获得感将学习由一项外部要求的任务变成一项内在需求的、有吸引力的探索之旅。

三、双向联动赋能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提升

学生课堂参与度同思政课获得感存在一种互相建构、互相促进的协同联动关系。教师可以从学生的提问、讨论、表情、作业等各个方面来对教学效果进行及时诊断，对学生认知盲区、思想动态、兴趣点等进行精准把握，并根据真实的学情反馈来调整教学内容的详略、案例的生动性、讲解的深入程度、互动方式的设计等。以学生参与反馈为基础的教學調整大大增強了教學的針對性和亲和力，使供給側更精準地对接需求側，从而為學生獲得感的提升提供直接保障。反过来，学生获得感有效提升可明显改善课堂参与质量与生态，促使教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当学生在课堂上不断得到意义感和成长体验感的时候，课堂就变成一个可以进行主动探索、平等对话、共同成长的价值共同体。在这种氛围中，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更愿意主动探究思政理论背后蕴含的逻辑和历史发展，将自己观点与他人讨论交流，促进认知发展，教学由原来的教师“独奏”变为师生“共鸣”。参与度和获得感的良性循环促使思政课教学实现了根本性的质量提升，双向联动的过程即为思政课发挥立德树人关键作用、实现内化式发展的生动体现。

学生课堂参与是获得感萌芽和生长的实践土壤和必经之路，获得感是学生由被动参与变为主动探究、由表层互动变深层次投入的动力源泉，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为使这一良性循环得以延续，未来思政课教学改革需要不断革新教学方法与载体，设计出更多的能够激发学生深度思考、主动表达、积极实践的互动环节，为高质量参与提供平台。经过系统改革，使思政课成为学生喜欢、终身受益的课程。

（作者单位：西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浅谈基层日常档案整理的问题与对策

马树龙

基层日常档案整理是基层档案管理工作核心基础，直接关系到档案资料的完整保管、高效利用以及民生服务的有效开展。档案作为基层各项工作的真实记录，是留存工作痕迹、解决群众诉求、应对工作核查的重要依据，而日常档案整理则是整个基层档案工作的起始环节和关键的一环。当前，基层日常档案整理工作在实际运用中仍存在诸多不规范、不细致的问题，如档案收集不及时、整理流程缺乏统一标准、工作持续性不足、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既影响档案使用效率，也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对基层档案工作的规范要求。基于基层工作实践，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就基层日常档案整理的相关内容，探寻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为更好发挥基层档案服务群众、助力基层治理提供参考。

基层日常档案整理，是对日常工作中产生的各类文件、民生材料进行及时梳理、归类、保管的工作，其重要性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首先，能够切实服务群众办事，基层档案涵盖民生社保、邻里纠纷、政务文件等各类内容，整理规范有

序，群众前来查询、开具证明时，就能快速找到对应资料，让群众少跑腿、少等待，真正方便群众办事。其次，能有效保障档案资料完整安全，基层档案大多是纸质材料，日常及时整理、规范存放，可以避免档案乱扔乱放、受潮破损、丢失遗漏，牢牢守住工作原始凭证。最后，能大幅提升基层工作效率，规范整理后的档案，调阅、查阅、归档都十分便捷，无论是日常工作开展，还是上级部门检查，都能节省大量时间，避免在杂乱的资料中浪费精力，让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整体工作。

当前，基层日常档案整理工作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实际问题。一是档案收集不及时。基层工作任务繁重，档案工作多为兼职负责，平时忙于各项业务工作，往往容易忽视文件材料的及时收集，经常出现业务办理完成后，资料积压、随手放置的情况，久而久之容易造成重要档案遗漏、丢失。二是整理流程不够规范。由于自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加上基层专业培训机会有限，对档案分类、装订、编号、编目等标准掌握不到位，时常出现不同年度、不同类型的档案

混放混装，装订不整齐、编号混乱等问题，导致档案难以快速检索。三是整理工作缺乏持续性。日常工作中没有养成定时整理的习惯，大多是等到上级检查、需要用档时才集中整理，大量资料堆积后，整理难度加大，也难以保证整理质量。四是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基层档案工作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的档案管理知识储备，对档案整理的规范要求及工作技巧掌握不足，仅凭经验做事，难以达到标准化整理的要求。

针对以上实际问题，结合基层工作条件，可采取以下简单易行的日常档案整理方法。第一，养成及时收集的工作习惯。严格落实“随办随归、日清周结”的原则，每天办理完业务后，及时收集相关纸质资料、电子文件，每周抽出固定时间进行初步梳理，杜绝档案资料积压，从源头保证档案收集全面、不遗漏。第二，按照简易标准规范整理流程。结合基层实际，按照“年度+档案类型”的方式简单分类，将文书档案、民生档案、业务档案分开归类；整理时拆除材料上的订书钉、回形针等金属物品，用统一的装订方式装订整

齐；按顺序编写页码、填写档案目录，清晰标注档案类别、年度，方便后续查找。第三，坚持常态化整理机制。将档案整理融入日常工作，不拖延、不敷衍，避免临时抱佛脚的集中整改，日积月累做好基础工作，既减轻工作压力，又能保证整理质量。第四，主动学习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加上级档案部门组织的基础业务培训，认真学习档案整理手册、工作规范，遇到问题主动向有经验的同事、专业人员请教，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基础档案知识，逐步弥补学历和专业短板，提升自身实操能力。

基层日常档案整理是一项平凡又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复杂的理论知识，却需要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即便专业基础薄弱，只要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日常每一项整理工作，就能把基层档案工作做实做细。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始终坚持规范整理与常态化管理，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能力，用心做好基层日常档案整理，让档案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工作。

（作者单位：延长县低保办）

浅谈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对策

何亮

延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安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黄帝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与黄土风情的精神内涵，也是延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与革命圣地的重要标识。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传统依靠口传心授、实物留存的保护模式，已难以应对传承断层、传播乏力、濒危技艺消失等现实挑战。加快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成为推动延安非遗活态传承、建设文化强市的重要途径。

一是规范技术标准，搭建市级非遗数字管理平台。针对当前延安各县（市、区）非遗数字资源采集不规范、数据格式不统一、资源分散等问题，建议以国家和省级非遗数字化标准为依据，结合安塞腰鼓、陕北民歌、延川剪纸、陕北说书等项目特点，制定本地数字化采集、归档、存储细则，统一数据格式、采集参数与著录规范，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搭建延安市

非遗数字资源管理平台，整合全市各级非遗项目资料，建立分级分类数据库，打通数字文化平台的对接渠道，实现资源集中管理、规范使用与公益共享。

二是坚守文化本真，强化技艺与数字融合保护。坚持“文化为根、技术为用”的原则，在数字化采集、制作全过程中吸纳非遗传承人、文化专家参与指导，完整记录工艺流程、民俗仪式、文化寓意等核心内容，杜绝为追求传播效果而随意改编、弱化文化内涵的现象。对高龄传承人及濒危非遗项目，优先开展抢救性数字化记录，全面录制技艺实操、口述历史、民俗场景等资料，建立完整数字档案。明确数字技术的辅助定位，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传承效率，而不替代传统传承方式，确保非遗本真性与完整性。

三是健全权益机制，保障传承人主体合法权益。依据国家及省市非遗保护条

例，联合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完善非遗数字资源版权管理制度，明确数字资源版权归属，确立传承人在资源使用、收益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分类授权机制，公益使用规范流程，商业开发严格实行传承人授权与收益分成，杜绝无偿占用与侵权盗用。运用数字水印、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搭建版权监测渠道，加强网络侵权排查，简化维权流程，为传承人提供指导服务，切实维护合法权益，提升传承积极性。

四是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区域保护均衡发展。针对基层数字能力薄弱、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构建“高校+机构+传承人”协同培养模式，与本地院校合作开设非遗保护与数字技术相关课程，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面向基层非遗工作者和传承人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普及采集、剪辑、线上传播等实用技能，提升

数字素养。实施县域对口帮扶，加大对偏远乡（镇）、村资金、设备与技术支持，推动专业力量下沉基层，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全市非遗数字化保护整体水平。

五是深化数产融合，实现非遗活态长效传承。以数字资源为基础，推动非遗与文旅、文创、教育融合发展。鼓励企业打造线上数字展厅、VR体验项目，将非遗数字元素融入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体验。依托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平台，组织传承人开展线上展示与产品销售，拓宽传播与增收渠道。同时建立保护成效评估机制，以文化传承质量、技艺保护效果为核心指标，防止过度商业化，实现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让延安非遗在数字时代焕发新活力。

（作者单位：延安市文化馆）